

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

——以浙江宁波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刘华安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浙江 宁波 315012)

摘要: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例。鉴于浙江宁波行业协会近年来发展较快,且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行业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分析认为,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由于制度环境和自身功能的限制和约束,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缓与释放,也有赖于公民社会自身的争取。

关键词:公民社会;行业协会;浙江宁波;政府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1-0087-07

20世纪90年代,构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是市民社会论者的理想。与“全球公民社会”概念相对,本文提出“地域性公民社会”概念。公民社会是一个抽象概念,公民社会结合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景象,“地域性公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主要原则、特征、制度结合不同地域的外在表征。本文无意用地方性来消解整体性,但整体性是地方性的一种抽象。简言之,本文更关照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从世纪之交到现在,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的公民社会理论^[1]继续作为一种理想范式不断引发讨论并得到引证,国内相关学者尝试超越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抽象对立,寻求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可能^[2-7]。反映在政治社会学上,公民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其实证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产生了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的成果。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民间组织的发展程度来衡量”^[8],所以NGO(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最为集中。这些研究涉及NGO生长的环境特征、合法性问题、内部组织与自主治理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9-16]。而行业协会作为NGO的集中体现者,对其进行研究无疑是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的讨论与探索。可以看到,对中国行业协会尤其是浙江温州的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外学者对中国NGO尤其是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一般采用2种分析方式:公民社会和统合主义。一些学者运用公民社会的范式实地考察中国各地的NGO后认为,虽然它们在表达和维护支持者利益上发挥着组织性的功用,并且相对独立于国家,因此把这些NGO尤其是行业协会看成是在国家空隙中生长的公民社会。与此相对,另外一些学者把基于建立在法治社会、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体制基础上的欧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刘华安(1974-),男,江西九江人,讲师。

洲自由资产阶级时期的公民社会模式和晚近东欧民主转型经验的公民社会模式用于分析时空不同、文化体制各异的中国,提出了相当多的置疑。一些学者进而选择统合主义分析方式对中国各地的行业协会进行了探讨,认为行业协会具有统合主义组织的特征:行业协会需要国家批准;行业协会与地方组织之间存在明显等级;行政官员在协会中担任领导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解释范式虽然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从大多数行业协会中寻找独立于国家的利益集团的迹象是不恰当的。总体上,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仍然表现出忽视自身发展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公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研究,仍然假设了遵循西方路线的、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再到政治民主的演进路径,“强烈地暗含了对西方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预设”^[2]。因此,如何利用民间组织的发展经验获得中国公民社会的自我理解,仍然是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

宁波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历史上曾是“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有着长期经商办企业的历史。宁波商帮是中国近代商业贸易史中的重要商帮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产生了各种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等社团性质的民间组织。近年来,宁波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也为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1989 年底宁波全市行业协会仅有 11 个,到 1999 年底发展到 60 家,截止 2005 年底,全市已有各级各类行业协会 393 家,形成了以总体规划、重点培育、自愿组建、积极探索为原则,立足于构建功能齐全、重点突出、优势强健、定位科学、职能明确、机制灵活、运作有序的行业协会组织体系。宁波私营企业发达,这些具有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的行业协会在不同领域发挥着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的功能,甚至已经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自主利益组织化的表达机制^[10]。

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发展优势具有特定性,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创新、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自组织等要素构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一般条件,这使得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预示着地方性公民社会的生成,还是政府权力的延伸? 行业协会是否已经成为维护集体权益的利益集团? 行业协会是否承担着地方性公民社会的作用?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宁波行业协会

与市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创新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地方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限度。

一、行业协会的生成与 地方政府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大多是在政府的扶持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宁波市的行业协会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推进,行业协会发展呈现加速之势。1980~1989 年宁波市行业协会只有 11 个,其中市级 9 个,1990~1999 年行业协会 60 个,其中市级 23 个;到 2005 年底,全市已有各级各类行业协会 393 个,其中市级 85 个(表 1)。1997 年行业协会占全市社团总数的 5%,到 2005 年为 27.6%(表 2)。与此同时,行业协会门类众多,覆盖面不断扩展,专业化趋势凸显。在宁波市行业协会发展初期,协会涉及的行业仅仅局限在包装、食品和交通这三大领域,随着建筑、科技、农业等行业的发展,目前宁波行业协会已经覆盖了全市城乡,触角几乎遍及工业经济、农林渔、交通、建设、财贸等所有行业(表 3)。

表 1 1980~2005 年宁波市行业协会发展 个

年份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5
全市	11	60	393
市级	9	23	85

表 2 2002~2005 年宁波市行业协会占全市
社会团体总数的比例

年份	全市社团 总数/个	全市行业 协会总数/个	全市行业协会在全市社团中 所占比例/%
2002	1 203	308	25.6
2003	1 361	386	28.4
2004	1 397	406	29.1
2005	1 425	393	27.6

表 3 2007 年宁波行业协会在本市及其所辖的慈溪市、
宁海县、镇海区、北仑区、鄞州区分类情况

地区	社团总数/个	行业协会总数/个	行业协会在社团中比重/%
本市	362	80	22.1
慈溪市	150	42	28.0
宁海县	102	43	42.2
镇海区	74	14	18.9
北仑区	83	16	19.3
鄞州区	103	29	28.1
合计	872	224	26.0

通过近 30 年的发展,宁波的市场经济发育得相当成熟,不但经济总量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1978 年宁波市国内生产总值为 24.1 亿元,到 2007 年达到 3 433.1 亿元,增长了 142 倍。宁波市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1994 年宁波市民营企业有 7 694 家,到 2006 年底,全市共有民营企业 8.32 万家,注册资金 1 132 亿元,民营经济创造的 GDP 接近全市总量的 80%,创造的利税约占全市的 70%,创造的就业岗位接近全市的 85%。2006 年底,宁波市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2 025.01 亿元,户均 9.78 亿元;资产总额为 1 393.96 亿元,户均 6.73 亿元;税后利润总额为 950 943 万元,户均 4 593.93 万元。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这种内在需求催生和发展了各类民间商会。但与温州原生性的纯粹私营经济模式相比,宁波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既不同于“温州模式”的全体民营战略,又不同于新“苏南模式”的两头在外之道(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更不同于青岛经济中的国有成分独强的态势。宁波经济发展模式源于其混合经济发展道路的“宁波模式”——民营、集体、国有和外资互融模式,而民营经济正是其中的生力军。与温州商会相比,宁波市行业协会总体上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宁波地方政府扶持和培育行业协会的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便更好地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政府职能过多会影响政府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绩效,而行业协会可以在这方面做好政府的参谋和帮手,沟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协助地方企业开拓市场、开展市场信息交流、创新企业技术、塑造行业形象、解决贸易争端等。因此,行业协会的培育和发展被纳入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市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也对行业协会的培育发展进行部署和安排。

行业协会的产生在宁波具有行政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协会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被忽略。地方政府扮演着行业协会自治性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其自主性和自治性是指组织自治、经济独立、活动自由和地域开放。在《宁波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中提出行业协会必须遵循“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的办会原则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和自求发展”的

活动方针。其中还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行业协会独立自主办会”,“国家公务员和依(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秘书长及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国务院 1998 年 10 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从实践看,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双重管理制度导致了行业协会缺乏自主性,对于政府和行业协会两者都是伤害。为改变这种状况,国务院办公厅 2007 年 5 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确需兼任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在推动行业协会自治化的过程中,宁波市民政局和宁波市经贸委作出了很大努力,同时推动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化积极推动了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宁波行业协会功能的范围不断扩展,服务多样化,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有:协助政府疏通行业内外各种关系,促进企业结构调整,收集市场信息,举办各类产品交易活动;参与企业技术引进的分析论证,考察产品交易活动;研究制定行业产品的统一规格和技术标准;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密切行业之间的联系;为企业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开展各类培训;汇总行业产销情况,对重大问题以及企业的意见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组织行业内外交流,促进行业横向经济联系;提供企业法律服务,维护会员利益。按照行业协会职能发挥的强弱情况,将宁波市行业协会功能发挥的情况进行比较(表 4)。

表 4 宁波市 224 个行业协会中作用发挥情况比较

序号	主要作用	协会数/个	比例/%
1	创办内部刊物,开展信息交流	164	73.2
2	参与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	135	60.3
3	提供管理服务	135	60.3
4	开展培训	132	58.9
5	组织举办展览展销会,开拓市场	107	47.8
6	提供技术服务	105	46.9
7	制订行规	96	42.9
8	参与制订行业政策	84	37.5
9	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会员利益	60	26.8

与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相对应,地方政府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诉求也依赖于行业协会的积极配合。通过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利益契

合,最终两者将形成一种相对稳定而有效的互动机制,使行业协会最终嵌入地方治理体系之中。

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打破政府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有利于双方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推进公共服务创新。

从总体上说,宁波行业协会的自治性不是自身主导的,而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型的特点使宁波行业协会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行业协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始终处在弱势地位,现阶段宁波行业协会的良性与持续发展更多依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释放。

二、行业协会与企业的互动

发达的民营经济是宁波市行业协会发展的市场因素。宁波市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带有一定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如集体声誉、竞争秩序、行业信息等)无法在体制内供给,当这种供需矛盾激化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私营企业主必然要寻求一种体制外的资源——自律中介组织,弥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行业协会具有调节市场主体利益、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能够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治理主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政府与市场二分现象。宁波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有会员企业 200 多家,宁波市服装协会拥有会员企业 200 多家,宁波市水产协会有单位会员 138 家,这些行业协会普遍具有较高的入会率,它们以主行业企业为主,配套行业企业为辅,吸收了各种经济成分、各种规模的企业,使得行业协会真正成为这个行业的代表机构,体现了行业的利益。宁波市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的是家族化治理模式。在经济探索的实践中,民营企业发展培育了自治自理的文化理念,这为行业协会的产生除却了观念上的障碍,降低了制度创新初期的摩擦成本。

产业集群也是宁波市行业协会成长的一个促进要素。和温州相似,宁波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以低成本要素和精细分工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人际关系和市场网络为支撑的营销网络和营销能力基础之上,其运行机制极具社区性^[17]。正是建立在这种社区内的由利益、文化、习惯、道德

和血缘所构成的合作关系,使得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内在推动力。近年来,集群资源供给“瓶颈”的出现和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得集群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受到严峻挑战,集群组织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层次偏低、产品附加值低等弱势越发明显,集群企业压价竞销、仿冒、偷工减料等无序竞争使集群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集群企业在信息交流、理念统一、集体行动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宁波市行业协会的日常运转除了需要政府的支撑外,必须得到企业、行业的支持,通过行业获取话语权,从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从理论上说,行业协会基于与会员企业的密切合作关系,比政府更能了解行业的需求,并能够调动政府无法调动的资源,从而更加充分满足企业的各种需求。对宁波市行业协会与企业互动关系的考量应从 3 个方面切入。一是企业对行业协会的支持度考量,二是行业协会对企业支持度的考量。

(一) 企业对行业协会支持度

企业对行业协会的支持集中反映在企业对行业协会的参与上,而作为企业代表的企业家对行业协会的参与直接反映了行业企业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2004 年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调查表明,选择“有必要加入协会”的只占到 36%，“无所谓”占 46.8%，“没必要”的占 3.7%。同时发现,多数企业选择“没必要”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在会员与非会员之间无太大的差别,加入、不加入差别不大。从郁建兴、徐越倩、江华对温州协(商)会会员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在 295 家受访的会员企业中,其中 198 家对协会职能履行情况“很满意”或“较满意”^[18]。

对宁波市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企业对行业协会的参与除了协会服务因素以外,还存在诸多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行业协会的竞争程度。一般意义上,行业协会在该行业影响大、而没有其他协会能够替代,该行业协会就能在该领域里获得相对于影响不大且有其他协会能替代更多的声望、荣誉和资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影响力大的行业企业采取的是精英治理模式而非契约型治理,会长所在单位大部分是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很少。相关规章制度也由理事会决定,这些制度和利益分配原则对理事会成员所在企业有利,行业协会谋取的利益被这些龙头企业或大企业所垄断,致使宁波

一些行业协会出现了寡头治理倾向。

行业协会的发展如同企业的发展,良莠不齐。对于会员企业参与行业协会较少的原因,笔者也进行了相关调研。其中因素有:(1)行业协会专业人才匮乏。多数行业协会没有配置专职人员,会员年龄结构不合理,会员素质不高。2005 年据宁波市社团管理局的调查,宁波市、县级 224 家协会无专职工作人员的有 104 家,占总数的 46.4%。(2)协会财务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善。行业协会的经费来源一是会员会费,二是企业捐助,三是协会的服务经营收入。宁波市市级行业协会一年的基本开支为 10 万元左右,如果要正常开展活动,每年需要 20 多万元。而宁波市行业协会会费标准是每年 800 元,100 家协会一年也只有 8 万元会费收入。其他 2 项收入则很难保障。虽然 2007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对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开展业务活动或提供的服务,政府应支付相应的费用”,宁波市于 2005 年就出台《宁波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提出了“政府应当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行业协会承担公共管理事务”,但在现实情况中绝大多数行业协会无法通过有效的服务手段营利。运行不良的协会因为无法提供有效服务,就不能吸引会员增加会费收入,也无法得到提供服务带来的营利收入,陷入了恶性循环。多数协会认为财政约束会限制行业协会职能的发挥,但如何突破这个经费难题,行业协会不是通过有效服务以吸收会员,从而实现营利,而是希望政府或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增加投入,这也充分说明了宁波市行业协会缺乏自主性(表 5、表 6)。(3)行业协会功能不够完善。一些行业协会过分依赖政府,无法创新自身的功能;一些行业协会功能单一,甚至沦落为只收取会费而无法兑现服务诺言的“专业收费协会”。

表 5 宁波市市级 80 家协会年活动经费情况

经费总量/万元	数量/个	占全部协会的比例/%
0 ~ 1	1	1.25
1 ~ 3	10	12.5
3 ~ 10	21	26.5
10 ~ 50	35	43.75
50 ~ 100	8	10.0
> 100	5	6.25

表 6 105 家县级受调查协会年活动经费情况

经费总量/万元	数量/个	占全部协会的比例/%
0 ~ 1	14	13.3
1 ~ 3	19	18.1
3 ~ 10	44	41.9
10 ~ 50	20	19.0
50 ~ 100	4	3.8
> 100	4	3.8

(二)行业协会对企业支持度

行业协会对企业的服务与支持,将直接影响其吸引力和生命力,也反映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会员利益,或者多大程度上反映着地方政府的意图。宁波市行业协会对企业支持情况的调查表明,行业协会主要是通过协助企业进行行业管理和代表行业企业进行利益诉求这 2 种方式开展工作的。(1)协助行业企业进行行业管理,主要包括协助企业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确定行业标准,进行行业调查和统计服务,提出行业发展的建议。大多数行业协会都乐于此项工作,可以承接政府职能来提高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在行业中吸收更多的会员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从政府部门获取一定的经费支持。(2)代表行业企业的利益进行利益诉求。在行业协会内部,会员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给行业协会,这些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可能相互冲突。当会员企业发生利益冲突,行业协会就会对这些利益做出权衡,并运用行业协会章程、行业公约等规范和引导会员企业行为,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符合行业整体利益的各种事宜,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促成会员企业之间的合作,整合行业内部的各种资源,更为有效地完成目标任务。行业内部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往往更容易维持,而且在规范和约束会员企业行为方面发挥着“组织秩序”^[19]无法比拟的作用。各种内在制度对于建立密切联系的会员企业所起到的引导、约束作用往往比关系松散的企业所起到的引导、约束作用更大一些。在行业自治系统外部,行业协会代表着行业的整体利益向政府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谈判、协商消解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协会放弃部分自治权,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也放弃部分强制权促成各种自治社团与其合作。近年来,宁波行业协会针对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争端强化了自我维权功能,如针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积极组织相关企业进行反倾销的应诉工

作,在代表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宁波市一些行业协会经过培育后,利用其在行业中的强势地位(更确切地说是利用行业的强势地位),在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时超越合法利益边界。如为了制止企业间残酷的价格竞争,协会制定“自律价”;为降低成本,行业协会制定技术人员最高工资和限制人才流动等,给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制度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给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造成了明显的障碍。

三、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有利其壮大和成长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对外开放后各类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涌入为民间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20]。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并未因公民社会的生发而产生质的变迁,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大量不利于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对宁波市行业协会的考察必须将其置于这个宏大的背景。

宁波市行业协会从行业企业得到了很大的支持,获取了一定的自我活动空间,拥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那么行业协会是否获得代表行业企业的正当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平等博弈关系呢?换言之,作为地域性公民社会集中体现的公民社会,是否拥有了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可能?从调研情况来看,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宁波市行业协会与政府相互借用的关系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消解的可能;另一方面,宁波市行业协会内部的寡头治理倾向限制了自身功能的发挥和进一步拓展。

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互相借用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也表明中国从总体上还未突破“强国家一弱社会”的格局。即使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 2000~2002 年对浙江省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对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多数社团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发起成立的,目的是协助其进行管理工作;党和政府有关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和政策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业务主管党委比登记机关具有更大的影响

力;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是通过推荐或派遣社团领导人、出席社团会议、参加社团活动、审查社团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派遣人员到社团任职并发放工资等方式影响社团;党和政府还通过在社团建立党组或选派党政官员在社团做领导来影响社团。宁波的情况也不例外。据宁波市民政局 2005 年的调查,宁波市市级 80 个行业协会中 26 个有各级政府公务员兼职,县级 144 家行业协会中 47 家有政府公务员兼职。这种行业协会与政府混合运作情形降低了行业协会的民间性。政府揽权和协会自治性降低无非是利益分割和利益博弈的结果。按照《宁波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行业协会逐步转接原本由政府部门所有的行业调研、评估论证、公文证明、技能资质考核、职称评定、行业准入、行业统计等职能。这无疑大大削减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政策执行结果遭遇很大阻力。政府并非愿意包揽一切行业协会,对于不同的行业协会采取区别对待,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的方针^[8]。对于社区服务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慈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治性组织,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多采取支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并采取措施加以扶持,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们的作用。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协会,党和政府采取控制型政策,这些政策是建立在防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有意无意地把公民社会组织塑造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把公民社会塑造为合作伙伴的可能。而对于一些实质性行业管理权,政府将本属于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权收归自己所有,而不会下放给行业协会。

同时,宁波市行业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存在依赖意识。不少行业协会不愿意与政府部门划清界限,希望从政府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行业管理权是其争取的焦点,表现出追求行政级别和待遇的行政化色彩。行业协会为了在行业里树立龙头形象,扩大声势,聘请退休或即将赴任的官员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或秘书长。这些名誉会长或秘书长通常无暇顾及行业协会的实际工作,但是行业协会借用官员(政府)的声望可以拓展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在一些关键地方可以协调矛盾。实用主义的立场和就事论事的合作态势是宁波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根本表现,宁波行业协会对于政府的依赖状况也导致其对政府制衡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也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

在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协会内部治理寡头化的不良倾向,行业协会成为一些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和获取资源的渠道,尤其是一些社会影响力大、经济资源丰厚的行业组建的行业协会,对政府和行业的良性互动造成了很大障碍,也影响了协会本身的绩效。

四、结 语

用晚近东欧民主转型经验的公民社会模式分析时空不同、文化体制各异的当前中国现状,结果肯定是让人失望的。特别是当它卷入意识形态的论争中,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反国家形象出现时,反而降低其在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析上的价值。正如学者甘阳指出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绝非是时下许多人片面强调的那种简单对立以致对抗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所建立的正是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具有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公民社会的生发及其行政力量主导,构成了国家存在的理由,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存在是公民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保障。

宁波市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表明,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中,两者关系并不平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政府持续地释放政治空间。行业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政治前提,那就是权力多元化,而地方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采取的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方针的后果将是民间力量的不平衡,宁波市行业协会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更加突出了地域性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

对于地域性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而言,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在当前,地方政府应该推动并激发社会将自我组织和公民直接参与当成目标。地方政府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治理创新和公民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对于地方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推动观念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争取更多的社会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真正承担起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社会两大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 约翰·基恩.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9.

- [2] 邓正来. 哲学与公共问题(笔谈之二): 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6(3):5-9.
- [3] 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 中国社会科学,2006,27(1):109-122.
- [4]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 郁建兴,周 俊.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7(3):36-45.
- [6] 郁建兴.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行性[J]. 文史哲,2003(1):75-81.
- [7] 贾西津. 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三条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2003,19(3):22-23.
- [8] 何增科.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6(4):80-86.
- [9] 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1(2):100-109,207.
- [10] 陈剩勇,汪锦军,马 斌,等. 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1] 郁建兴,王诗宗,黄红华,等.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 [12] 王 名,刘国翰,何建宇. 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3] 王 名. 中国 NGO 研究 2001:以个案为中心[M]. 纽约: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2001.
- [14] 王 名. 中国 NGO 研究:以个案为中心[M]. 纽约: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2000.
- [15] 余 晖,邱靖基,郑江淮,等. 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M]. 北京:经济出版社,2002.
- [16] 邓国胜. 非营利组织评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7] 马 斌,徐越倩. 社区性产业集群与合作性激励的生成:对温州民间商会生发机制的社会经济学考察[J]. 中国工业经济,2006,24(7):65-72.
- [18] 郁建兴,徐越倩,江 华.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6):5-15.
- [19]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韩朝华,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 [20] 倪志龙. 浅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问题[J]. 云梦学刊,2007,28(2):82-83.

(下转第100页)

- [15] 杨明伟. 政治宽容: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 23(12):150-153.
- [16] 金龙. 政治宽容:概念的厘定[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1(2):43-45.
- [17] 李德顺. 宽容的价值[J]. 开放时代, 1996, 15(1):1-2.
- [18] 罗维. 政治妥协:何以可能?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18(2):156-160.
- [19] 阿克顿. 自由史论[M].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等,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 [20] 万斌, 罗维. 论政治妥协[J]. 浙江学刊, 2005(1):62-69.
- [21] 彭柏林. 公益伦理的界定[J]. 云梦学刊, 2007, 28(6):57-60.

Public reason: value of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demand

SU Li-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China)

Abstract: As the “people discovery” has become the main theme, differences in society can be formed, thus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is formed and matured. Values, the concept of incommensurability may inevitably lead to social conflict and tension. Public reason is not only citizen interaction with the demeanor of the good society, but also a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and can reach consensus and move toward a harmonious society. Public reason’s manifestations includes trust, tolerance, compromise and consensus.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ason depends on the shaping of “public persons”, and individual and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go from the narrow-minded individuals to public reason. Government should reconsider the resumption of “public persons”, their sacred role, their public execu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ir right to refusal.

Key words: pluralistic society; public reason; social conflict; public person

(上接第 93 页)

Development and limitation of regional civil society

——Inspection to Ningbo trade associ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LIU Hua-an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Ningbo 315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rade associations has become popular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for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also fully displayed their functions in serving thos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Ningbo of Zhejiang,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ation of the region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Ningbo trade associations due to the regulation environment, self functions, their low autonomy ability and over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releasing and easing of political space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on striv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in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trade association; Ningbo of Zhejiang; transformation for government function